马勇：我的书房，为用不为藏

绿茶

1979年，恢复高考第三年，马勇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到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正是这本书影响了马勇的学术方向，书中提到哪本书，就把那本书找来看，大学四年，几乎把大学图书馆里与思想史专业相关的书都读了一遍。

1983年，马勇顺利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著名思想史学家朱维铮教授。1986年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从事近代史研究。

马勇上大学前当过兵，也当过工人，他是带薪上学，所以，相较同学们生活条件好一些，也有富余的钱买书。大学期间就买了很多书，毕业来京时带了十二箱书，这是他最初的书房家底。

从学习古代史到从事近代史研究，这个路径促使马勇必须把中国历史打通，家里的藏书也涉及中国历史的不同断代和方方面面，这也是客观造成马勇家里书量很大的原因之一。

像大多数爱书人一样，马勇家每个房间也都是书，但多而不乱，不同书架都有各自的主题和分类，像客厅沙发背后，以书目、索引、年谱、日记等书籍为主。马勇反复强调，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书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学问路径，知道哪些书在哪里可以找到。

而谈到书房的未来，马勇也是愁上心头。他说，人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人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变得很可怜。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勇老师的书房，听听他分享的书房故事。

▲马勇在书房一角。绿茶摄

▼马勇书房手绘。 绿茶绘图

我的阅读启蒙从地震棚开始

绿茶：您的书房是怎么样一个成长过程？

马勇：我是农村出来的，父亲读过私塾，对孩子读书还是很支持的，我们小时候，如果你愿意读书，就会给你创造条件。印象中，上世纪60年代，邢台地震，我们安徽家家都搭地震棚，我和大弟一人一个地震棚，在里面读书，我的阅读启蒙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

但那时我们能读到的东西很少，印象中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巴金的作品。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到新华书店买过一套鲁迅的单行本，就是人民文学那套白皮本，后来我把它们装订成册了。

1986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来的时候，我带着全部资产就是十二个纸箱的书。我为什么能够在七年读书期间积累那么多书呢？因为我是带工资上学，像有一套《中华大词典》，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买的，当时大概就三十来块钱。

刚来北京，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东四头条社科院宿舍院内，给我的是一个20平方米的里外间，根本谈不上有书房。但我们宿舍离单位近，我的书都放在办公室。2005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前，我的书房就是办公室。

办公室是个内外间，但我因为书增长得太快，很快一个人就占了内外间。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十点多才从办公室出来回家，第二天送完孩子又去办公室。2005年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

2005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后，有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书房，但实际上每个房间都是书，楼下还有一个地下室也是书，加起来大概有三万多册书。直到去年退休前，才彻底把办公室的书都搬回到家里来。

从读书开始，专心读了十几年

绿茶：除了做书房的办公室，你们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阵地吧。

马勇：对。我1986年毕业，到1991年才发第一篇文章，我老师朱维铮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发文章，要多读书。所以，那些年我每天就是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再借再还。当时做的第一个课题是梁漱溟，我做了很多前人没挖掘过的材料工作。包括后续做的几个近代人物，比如蒋梦麟，在我做之前，国内找不到一本关于蒋梦麟的书，我从香港、台湾等地方收集、挖掘了很多材料。

我是学古代思想史的，后来到近代史所工作，当时的研究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刚来的年轻人，老先生不让我们写东西，也没那么大压力，就静静地读了五六年书，算上本科，专心读了十几年书。

等到后来开始写东西时，脑子里对历史有无数种自由组合，也知道材料在哪儿，随时可以调动这些资源。我写东西面比较广，得益于当年阅读比较系统，可以从古至今打通。

（注）2000年时，近代史所承担了一个编撰《中国近代通史》的课题。之前马勇发表过关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文章，所长就让他负责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一个时间段的写作。2014年，由近代史所中青年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出版。

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

绿茶：在书房和图书馆这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哪些书要收在家中，哪些去图书馆阅读？

马勇：我的书基本是一个流动状态，我正在做的题目，这些书都在我的书房，暂时不做的就搬到地下室去。需要参考和补充的基本是去图书馆，但很多时候，做研究需要借助更多的地方。比如，我当时做蒋梦麟的研究，大陆各图书馆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什么材料，就需要去台湾、香港等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而我的书房本身，我保持它是流动的状态，随着自己的研究变化而变化。我的书房是用的书房，而不是藏的书房，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是因为藏而买的。

客观造成我书多的原因是，我原来做古代史，所以积累大量的古代史方面的书，大学毕业后做近代史，又大量购买近代史方面的书。加之三十多年来，我的书都跟着题目走，不同的题目又增加了不同的书。比如，刘大年找我合作做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就增加了大量抗战史的书。后来做严复的研究，关于严复的书基本上都收齐了，还去沈阳看严复的资料、手稿等。之后，又做章太炎的研究，用三年的时间读章太炎的资料，《章太炎全集》最后就是我参与一起合拢的。

还有由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汝信牵头的“世界文明研究”，这项研究也一直在进行，我参与其中“中国文明的研究”，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了。围绕这个主题，又扩充出很多书。这些年来的课题经费，基本上都换成书了。

到目前为止，我自主性的研究比较少，只有梁漱溟算是我自选的，还有几本论文集。而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上世纪90年代初，庞朴主持“中国儒学”项目时，曾约我参与，第一卷《儒学简史》就是我写的。

书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就很可怜

绿茶：这么多研究项目，如此高速的图书增长，您的书房如何容纳得下，有什么好的书房优化手段吗？

马勇：我会随着项目的变化，处理一些书，主要散给像孔夫子、布衣书局这样的二手书店。不散书，家里可容纳不了。淘汰书很不忍，人都有占有书的欲望，但没有办法。别人送的书，我是不敢往外散的，这类书还不少，所以，我通常放在书房最高处，免得不小心散出去，就很尴尬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流动书摊看到自己送给一位老先生的书，可能是老先生过世后，家里人处理出来的。人的眼睛在这时候特别敏锐，一眼就看到自己的书了。

绿茶：这就涉及书房的未来，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积累了一辈子的书，人不在之后，书房里的书就像孤儿一样，不知如何托身。

马勇：是啊，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这些书对我们来讲是宝贝，但对后人或图书馆来讲反而是个累赘。像我们单位图书馆，有故去的老先生要捐书，图书馆要查重，重复的不收。将来怎么来处理学者的书，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的书如果捐给一个新成立的大学历史系，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可以构成一个历史系整体的架构。人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就很可怜。

绿茶：您有自己的找书路径吗？这么多书平时能找到吗？

马勇：经常找不到。昨天还在找一本丁韪良的书，我百分百知道我有，就死活找不到。我的书房已经是分类很清晰的，就算有些书架是里外两层，我大致也有规律的，里面一层多半是平时用得少的全集、套书一类。

碰到找不到书的情况，我一般上网下载电子版先用，也许过不了多久，找不到的书又自动出现了。很多大型的书我一般保留电子版，比如：《清实录》、国家清史档案丛刊，还有如大象出版社出版虞和平主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全套三十多万，我买个电子版才一百元。再比如《徐世昌日记》，定价两万多，我当时特别想要。后来有个学生说帮我复印。一本日记印下来才一百块钱，全部下来才几百块钱。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在台湾中研院访学，我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想用的材料，送到外面一个复印的地方印回来。早期，蒋梦麟的资料，我都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复印过来的。

会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

绿茶：我看您书架上有很多目录学方面的书，这也是您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吗？

马勇：我很同意历史学家陈垣的一个观点，他说：“人的学问最终是一个书目”。他通读了《四库全书》，人怎么可能通读完《四库全书》呢？他其实是在读书目。我的太老师蔡尚思，一个假期读完了江南图书馆，其实他也是在读书目，后来，当然写了很多关于目录的书。

会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你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书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学问路径，知道哪些书在哪里可以找到。老一代学人非常重视收集和阅读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我在上大学时反复读，这种书要读下来，会在心里形成一个学术的版图。这个是受张之洞的影响，他的《书目答问》就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举要性书目。做学问，就是要从这儿进入。

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似乎对书目、索引类的书不注意了，认为网上都有。但我遇到这类书，依然都买。因为互联网的检索系统和我们以前读书目在大脑里形成的检索系统，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脑子的学问地图和可以检索的学问地图相比，还是有自己的检索系统踏实。

另外，史料书，年谱长编一类的书，我都是遇到就买，尽管有些暂时不做，我也会收集起来，非买不可。

还有日记，我是见一本买一本。日记只要读的多了，才能体现出故事，单独读一本日记是没意思的，只有在不同记录的佐证下，日记的价值才越发呈现出来，可以从中类比出一些史料的真实性。比如《胡适日记》，写的当然是很真实，但是胡适有好多东西不写，于是，需要借助别的日记来看到他不写的那些东西。比如，胡适与曹诚英的故事，他自己日记里没记，通过别人的日记，慢慢就勾勒出来了。这些就是日记对于学术研究的独特功用。

绿茶：说到日记，去年有一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受到学界和文化界一致好评，这本日记应该很对您胃口吧。

马勇：这本日记很重要，我多年研究蒋梦麟，郑天挺是蒋的学生，所以，这本日记中有很多我以前没看到过的关于蒋梦麟的史料，价值很高，我还决定重新写一篇关于蒋梦麟的文章。你要是熟悉这里面的人脉关系，看这套日记，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绿茶：历史研究中，还有一类史料是报刊，您的学术实践中会采用到报刊资料吗？

马勇：真正有报纸是从1895年开始的，到1949年，这50多年是真正可以用报纸研究的历史。但是，我们首先要对民国时期的报纸有所了解，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取舍的判断。比如，同样关于革命，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民呼日报》等，立场肯定是革命是正义的、正当的。再看实业家张謇办的《星报》《通报》，以及他为大股东的《申报》等，就不是很主张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些背后的立场就是研究的关键，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参考，才能客观看待那段时期的历史，历史研究的温情，就是从这些细节中一点点呈现出来的。

历史研究拼到最后是史料解读的能力

绿茶：不久前读到一本北大尚小明教授的《宋案重审》，对史料的占有和运用真是炉火纯青，这种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主流吗？

马勇：尚小明教授是完全按照学术的路径在做宋案研究，他是史料派。他这个研究，之前有吴晗的底子，1949年前，吴晗一直注意收集宋案的资料，后来吴晗把这些资料都交给北大历史系了，这些材料在北大历史系多少年来一直没人去研究。在这批材料基础上，之后，凡是遇到宋案资料，他全部收集起来，就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尚小明做得很刻苦。民国历史走这条路是正路。

对于近现代历史研究，史料研究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古代史，就不一定是拼史料了。

比如，陈寅恪，他就不以史料为主，他只以二十四史的史料为准。罗志田教授也是，他不读奇稀史料，只读大家都读的公共史料。罗志田的研究路径是出新，同样的史料，他能解读出新意，他的解读能力很厉害。陈寅恪也是，他的隋唐史没有一条史料是新的，但他能解读出新东西来。余英时也是，他研究戴震，从来不看那些所谓稀见史料，就在公共史料基础上解读出新意。再就是，台湾的王汎森，也差不多是这个方法。

像北大的田余庆教授这一代学者，就在大家常识的状态下，能研究出你完全出其不意的结论，这就是历史解读的研究能力。北大中古史为什么牛气，就在于他们有很强的历史解读能力，这方面的传统来自于陈寅恪。虽然陈寅恪出自清华，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并入北大，陈寅恪几位重要学生如周一良、王永兴等都是北大历史系教授。

茅海建、沈志华、杨天石他们几位又是一路，他们主要看档案。他们的特殊研究思路，档案是必要的研究路径。

绿茶：最后，想再跟您请教一个问题。作为普通历史爱好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路径进入历史阅读，您认为非读不可的书有哪些？

马勇：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建议先读外国学者那些有大格局的通史作品。中国学者呢，要读点的研究。西方哪怕是一流学者，像史景迁这样的，史料解读能力都不行，中国学者在点的研究方面比外国学者强。外国汉学家的宏大叙事和全球视野，以及文笔是中国学者比不了的。像孔飞力的《叫魂》属于外国学者中点的研究极少极少的个案。

我比较推荐这些年出版的外国通史作品，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以及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等等。这三家如果能阅读得比较明白，会比较好地构建出大历史格局。读历史，还是应该从通史角度切入，从远古通下来，不要一上来就钻入点的阅读。

书房主人简介 |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记忆》《1911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并为梁漱溟、董仲舒、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走读

腰板上的『家训』

李传玺

到浙江考察时，笔者曾特意留下来去了趟招宝山（宁波镇海），没想到它还是后来淮军著名将领刘秉璋抗击法军侵犯的主要海防阵地。在山上，我了解到当年具体指挥抗击法军并将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打伤，致其最后死在台湾海面上的，是太平（今黄山区）人杜冠英。前两年，编写《徽州古村落》，想把太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徽州）的岭下（苏雪林家乡，苏辙后裔，苏辙曾在绩溪任职）放进去，去拍摄图片时，得知隔壁村子就是杜冠英（杜牧二子杜荀鹤后裔，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的杜荀鹤的诗《泾溪》（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就写于这一带，此处翻过岭上就是泾县）的家乡，他家的“希范堂”还在，墓也完好着。便极力也要把他写进去。

希范堂主体建筑虽完整保存着，但堆着杂物，在看时，突然看到它的正厅隔扇腰板刻有字，便随手拍了几张。2016年底，一家出版社非要我主编《徽风皖训》（介绍安徽历史上一些大家族和名家的家规家训），中纪委此时推出了绩溪章氏家族的家训，我自然要把它收进去，但在配图时，我突然看到章氏家族家训中的一些话与我在杜家隔扇腰板上看到的刻字相似。由于腰板上的话没拍全（主要是堆的杂物挡了），不敢断定有多少重复。去年秋冬之交，找了个星期天，我又跑到岭下一看。

受黄山市“百村千幢工程“的保护，希范堂已清理出来。此次我把所有腰板上刻的字都拍了下来。**如果把希范堂与其他皖南大宅相比较的话，它在木雕方面至少有两大特色，一是雀替的狮子，所有的嘴全用的是矿物颜料，至今仍鲜红欲滴，二就是正厅大门和隔扇的腰板全刻上了家训**。而拍了之后，我的心放下了，章氏家训与此处刻的只有两句话是重的。这里我把共十二块腰板（两边厢房处各两块，共四块，中间八块，其中大门对开两块）刻的家训推介给大家：

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

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奸。

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惠者不倾，择交者不败。

緜緜勿替，稼穑诗书；世世不坏，俭约勤劬。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根据腰板刻字的题署，可能是此时杜氏家族四个有名望族人的号），时说时行，行者都好。

东平为善（典故来自东汉东平王刘苍。刘苍成长以后，常愿为善事。有一次，父亲光武帝刘秀问他在家中做什么最快乐，刘苍回答说：“为善最乐”）心逾乐，房豹（房豹，北齐齐州<今济南>人。为政普行教化，与民休息，扶贫济弱，百姓因之安居乐业，由此深得后世好评）为官水变清。

全尔忠信，所以保心；去尔骄矜，所以保身。

廉泉一勺频分俸；仁粟千种更指囷（《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后以“指囷”喻慷慨助人）。

楼前仙留吹黄鹤，天上恩纶（出自《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意指恩诏）下紫微（即紫宫、紫微垣，喻指皇宫或天子）；拟把卿云（景云、庆云，比喻祥瑞）比卿士（意指从政者），一生常捧太易（天地未分之前的元气，或指“道”）飞。

位极三公（三公是中国古代朝堂上三个地位最尊显官职的合称）上，声称九老（原指唐朝时，胡杲、吉玫、刘贞、郑据、卢贞、张浑、白居易、李元爽、禅僧如满等九位七十岁以上的友人。喻指德高望重者）先；德宜康尔禄，天亦假之年。

白发荣归第，绯衣晚镇边，儿孙朝笏（朝会时所执的手板，指代为官）满，功绩太常（官名，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宜）传。

备致人间福，真祥降自天；两朝名将相，千古小神仙。

与章氏家族的家训对比，只有前两块是重的。这让我放心，也让我得出哪些是中国传统家族治家最基本的信条。

从这十二块腰板的刻字，可以看出三个层次：一是如何持家治家，并且告诫只有遵行，才能“行者都好”；二是如何从政为官，要忠信为官、勤政为民、慷慨清廉，只有这样才能保身保心，而且心身更加愉悦；三是如此治家为官，会给家族带来什么样的声望，给家族每个人包括后代带来什么样幸福。

皖南民居特别是徽民居特色鲜明，从意蕴上讲，就是强烈的伦理化，任何一个细节你都不要小看它忽视它，它背后可能都有着深沉的教谕。比如窗棂的冰纹，可能就是指一个人要成功，首先可能要经过一番艰苦的磨练；外墙角直角常常削去或打磨成圆弧状，可能既指与人为善给人方便，也可能指为人要圆润些，要学会退一步想。也有直接用语言来教诲的，但往往是对联与堂号。比如绩溪章氏西关古里职思堂的对联就是从家训中提出来的两句：职所当为必竭其力，思不出位无二尔心。我曾开玩笑说，完全可以用它来解释讲看齐见行动，这也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而像希范堂这样把教诲直接刻在正厅面向天井大门和隔扇的腰板上，让家里的每个人，家族的每个人，来家里的每个人，只要从这儿走过，就能看到读到，天长日久记在心里化到行动上。从整个皖南民居来说，应该是惟一的。

从艺术的角度看，刻字全部用的是行书，颇有王羲之体的特点，潇洒畅达，流利爽劲，似乎在带着微笑告诫子孙后代，但又不乏教训深刻的意味。

“希范堂”，在腰板上刻家训，也成为让人们追慕的典范榜样。